

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1979 ~ 1999

西 泠 印 社

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

1979 ~ 1999

西 泠 印 社

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

西泠印社出版发行 杭州东坡路90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余杭市华兴印刷厂印刷

1999年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16 印张:19.5 字数:51万

印数:00 001—1 000

ISBN 7—80517—437—7/J·438

定价:58.00元

2000 2.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
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刘 军

常务副主编：任世龙

副 主 编：王明达 李小宁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明达 王海明 任世龙 刘 军 刘 斌
李小宁 张书恒 芮国耀 陈元甫 黄 滋

前言

1999年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二十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考古、文物保护、古建筑设计与维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诸多方面的工作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下,开拓进取、艰苦创业、著书立说、发展壮大的历程,令人喜悦。

浙江的考古工作始于1936年良渚遗址的发掘,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事业迎来了勃勃生机,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坚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坚持配合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的有机结合,使浙江考古三大优势课题——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窑窑址考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是我所考古工作的重点。河姆渡遗址、罗家角遗址、跨湖桥遗址是迄今为止我省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们分属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考古,继闻名中外的河姆渡遗址发现发掘之后,在宁绍平原上广泛开展了新一轮的考古工作,慈湖、名山后、鲳山、鲞架山、塔山、沙溪等遗址的发掘,使宁绍平原史前文化的时空空白得到了逐步填充,河姆渡文化的编年及谱系日益明确,进一步表明河姆渡文化灿烂辉煌,不愧为中国史前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多处良渚文化遗存迭压在河姆渡四期之上的地层关系,为研究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良渚文化考古,二十年来更是捷报频传,1986年以来发掘的反山、瑶山、汇观山及莫角山(古上顶)遗址,分别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使我省良渚文化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特别是在余杭良渚、瓶窑、安溪三镇范围内发现了八十多处遗址,其中有大型建筑遗迹和随葬大量精美玉礼器的显贵者墓地和祭坛多处,其中证实在这面积约33.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存在着一个高规格、高等级的政治实体,而莫角山(古上顶)遗址就是这个实体的中心。良渚遗址群当之无愧的成为良渚文化的中心。

与此同时,我所在崧泽文化考古及浙西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1996年嘉兴南河浜遗址的发掘,发现崧泽文化晚期人工堆、筑的高土台一处,墓葬90余座,不仅为良渚文化时期的“土筑金字塔”找到了渊源,而且为崧泽文化过渡到良渚文化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1997年遂昌好川墓地的发掘,是我所在浙西南考古中的一次重大收获,80座墓葬中丰富的出土物告诉人们,在这深山僻处,远在距今4000多年前,就有一支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文化在此生长繁衍。上述两项发掘均被中国文物报社评为当年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提名荣誉奖。

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考古经过多年的努力,也取得了可喜的收获。通过分布在浙江广大地区土墩与土墩石室墓的大规模发掘,我省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发展序列已经逐渐被认识。而春秋大国——越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绍兴306号墓的发掘,以精美的伎乐铜屋和玉耳金舟第一批珍贵文物出土,揭开了越国昌盛一时东南霸主的面纱。新近发掘的印山越王陵墓,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宏大,结构最特殊的木椁墓,推动了越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印山越国王陵发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6——1998年度田野考古三等奖。

同时,被中国文物报社评为 199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秦汉以降历史时期考古,主要对汉唐时期墓葬发掘与研究投入了较多的力量,对于了解汉唐时期浙江地区的丧葬礼俗。进而研究多个时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材料。临安水邱氏墓,钱氏捍海塘遗迹,瑞安灵石寺塔,上述这些挂一漏万的考古成果,大大丰富了浙江物质文化史、美术史和科学技术史等内容。

作为浙江考古三大课题之一的瓷窑址考古,二十年来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省的古代瓷业遗存遍及全省各地,作为瓷窑址考古对象的古代瓷业遗存分布形态丰富多彩,历史悠久,为瓷窑址考古提供了异常丰厚的物质基础。80 年代初为配合紧水滩水库建设进行的多单位合作的瓷窑址考古,是龙泉窑考古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举。太白岸山头窑和源口窑址发掘,明确了龙泉窑制瓷历史可划分出自北宋至清代的六大考古期别,从而构建起龙泉窑“厚胎薄釉刻划花”和“薄胎厚釉形制类官”两大发展序列;厚胎薄釉、薄胎厚釉、厚胎厚釉三种产品类型的框架结构。1985 年乌龟山南宋官窑的考古发掘,从考古学上确证了“郊坛下官窑”之所在,在南宋官窑考古研究推向了新阶段。90 年代初开始在慈溪上林湖越窑瓷业遗存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查明了库区范围内存在着 117 处窑址,连同上林湖周围发现的窑址不下 200 处,使之与分布于曹娥江流域的东汉至南朝以降的青瓷窑址大型群落,构成地域有别、时代不同而又存在着发展渊源关系的两个瓷业文化,通过对上林湖高岭墩、荷花芯,古银淀湖寺弄口等窑址的发掘,获得了越窑制品及烧制工艺技术演进变化的重要实物标本,同时纠正了文献记载中“越窑消亡于北宋”的错误观念,大胆提出了“先越窑——越窑——后越窑”的全新论断。寺弄口越窑窑址发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 1996——1998 年度田野考古二等奖。同时,被中国文物报社评为 199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文物保护是我所的另一项主要业务工作,二十年来,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由浅及深的探索之路。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建立起一支具有较高素质,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结构日趋合理的科研队伍。积极把握文物保护领域中出现的新课题在文物保护理论、建立浙江文物史迹网、浙江民居研究及文物建筑维修技术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其中多项成果在国内文物保护领域处于前列。80 年代初,我们组织各地文物保护专业人员调查文保单位的保存情况,同时开展了全省文物普查,随后选择了一批具有浙江文化特色与优势的文物遗存,进行专题深入研究,先后调整公布了二、三、四批省级文保单位,推荐报批三、四批国家级文保单位,推荐报批了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历史保护区,建立起并不断充实着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用实物遗存架构起浙江历史发展网络框架。随着文物保护体系的建立,总量的扩充,我们加强了对全省文物史迹进行专题研究、组织多学科探讨文物史迹的保护利用方向,先后制订的普陀山宗教文物史迹保护设想,浙江名人史迹保护建议等,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使全省文物保护工作跃上新台阶。

二十年来,我所的文物保护研究人员积极总结前人文物保护维修经验得失,积极吸取国内外文物保护理论精华,努力探索适应我国、我省文物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先后主持设计维修了湖州飞英塔、兰溪长乐村古建筑群、瑞安玉海楼、衢州孔府、海宁海神庙、遂昌陈家大屋、苏州忠王府等约 100 余处各类文物建筑。近年来,针对文物保护单位由单组院落发展到组群保护直至保护整个古村落、古镇乃至历史城市的趋势,保护的 task 就不仅仅是保住修好、陈列利用,而需要在更大范围内综合协调解决保护与建设的矛盾、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为此,我所尝试与院校合作或独立编制大型文保单位及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先后完成《良渚文化遗址群

——六处遗址点的保护利用规划》、《长乐村保护规划》、《郑宅镇保护规划》、《余姚武胜门路保护规划》、《蒲壮所城保护规划》等等。

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我所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积极探索“一所两制”,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换机制,将文物保护研究室、古建筑设计研究室合并成立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对内承担文物保护、文物建筑维修设计,对外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承接文物建筑与仿古建筑设计,充分利用我所文物保护科研优势和古建筑设计一技之长,立足省内、走出国门,先后完成了尼泊尔中华寺仿古设计、美国洛杉矶千树庄园中国古典园林承建任务,在国内外赢得了信誉,站稳了脚跟,得到同行的肯定。

为了庆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我们特意编辑了这本论文专集,旨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促进我所文物考古与文物保护研究水平的提高。文集收录了文物考古、文物保护、古建筑维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方面的论文 25 篇,绝大部分为我所中青年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论著,集中地体现了我所后备研究力量的状况。作为一名老文物考古工作者,还有什么比看到年轻人的成长更让我兴奋呢?衷心祝愿我所每个中青年专业工作者成为“政治强、业务精、学风正、人品好”的 21 世纪文物考古科研人才。

由于时间仓促,编辑力量所限,文集恐难免有所欠缺,敬请海内外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刘 军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目 录

二十年来河姆渡文化的认识与探索	河姆渡文化课题组(1)
耆架山遗址发掘的启示	王海明 孙国平(17)
探索文明之路	芮国耀(23)
马家浜—良渚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方向明(33)
钱塘江两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关系初论	丁 品(49)
良渚玉琮新探	赵 晔(59)
良渚文化陶缸观察与分析	孙国平(70)
良渚文化的鸟与神	刘 斌(89)
良渚文化高土台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蒋卫东(96)
二十年来浙江商周时期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陈元甫(116)
论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	陈元甫(123)
浙江南部先秦文化遗存浅析	王海明(137)
关于马桥文化的几个问题	田正标(147)
试论菱形符号的产生、发展及意义	王宁远(152)
考古发掘中的“地层”问题	蒋乐平(161)
魂瓶与佛饰镜	黎毓馨(166)
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	郑建华(174)
良渚文化苕山片遗址保护规划初探	张书恒(202)
借鉴外国先进经验 力促我省名城保护	胡理琛(224)
村落·文化与空间构成	杨新平(235)
杭州历史文化名城跨世纪发展新论	张 革(255)
浙江海宁海神庙及其维修设计	黄 滋(264)
遂昌陈家大屋建筑特色分析	黄 彬(274)
论浦江郑宅古镇的保护	郑殷芳(282)
探索建立文物图书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	张建华 陈 力(294)

二十年来河姆渡文化的认识与探索

河姆渡文化课题组

(一)序 言

1973年,著名的河姆渡遗址被发现、并开始第一期发掘,立即轰动考古界。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地下文化层中,较完整地保存着古河姆渡人留下的、超出人们预料的文化创造成果及其相适应的生态环境资料。^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①独特的器物群。这是考古学文化最基本的观察标志,以有脊釜为代表的夹炭质陶器群和原始锛等石器形态,表明了杭州湾南岸存在着一支前所未识的史前部落。

②稻作农业。遗址第四层保存大量的栽培稻遗存,对稻种的鉴定有分歧,主要有“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水稻”^②、“籼粳并存,以籼为主的混合群体”^③、“梗亚种”^④几种意见,“这一矛盾现象可能涉及稻种起源与演化的机制问题”。^⑤另有研究认为河姆渡炭化稻粒中存在普通野生稻,^⑥这对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十分重要。

③木构技术与干栏建筑。榫卯技术殊为发达,梁柱交接榫卯、水平十字架交榫卯、双层榫头、梢钉、燕尾榫、企口板、4:1的榫头截面,均开创了后世木作技术的先河。木构件的建筑主体是干栏式建筑,即以承重柱和桩木为基础,上架大小横梁、铺板材,在这架空的基座之上构筑梁架及人字坡屋顶。^⑦

④环境对文化的诠注。遗址出土了无脊椎、鱼、爬行、哺乳四大类61个种属的动物遗骸,大量的植物片叶及果实也被保存下来。动植物鉴定与孢粉分析表明,遗址处在靠山近海的森林湖沼区,气候条件比现在的宁绍平原温热湿润,植被属于热带亚热带类型。^⑧不计其数的被食用的动物遗骨和芡实、橡子、老菱、酸枣等可食性果实,以及骨哨、骨镞、木矛、木桨等工具,均说明渔猎与采集业对农业经济的强有力补充。

⑤其它类。包括编结、纺织、髹漆、水井、水上交通的实物证据;体现在陶、石、木、骨、象牙器上的雕刻、堆塑、装饰、音乐方面的成就以及相应的审美与宗教情愫的文明程度。

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样著名的是西安半坡遗址。^⑨半坡遗址距今6500年,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C¹⁴测定年代为6900余年,作为旱作(黍、稷)与稻作两种不同的农业文明类型的代表,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证明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⑩这一结论冲击了“黄河中心”的史学传统,调整了考古界乃至整个史学界的研究心态和认识视野,尤其对南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成果,是浙江考古工作者胸前的一枚耀眼的勋章。但客观地说,遗址特殊的保存条件是决定性的,河姆渡遗址海拔低、地下水位高、第四文化层长期浸泡在水中,隔绝了土壤中的空气,大面积的有机腐殖质形成了4-5度的弱酸性成分,起到了天然的保护作用,

数量众多、品类丰富的植物果实、茎叶和动物遗骸、有机质工具、生活用具、木建筑构件均得以保存下来,成就了河姆渡遗址在农学、建筑学、生物学、地质学、美学等多学科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七十年代末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水稻向河姆渡溯源,成为两国文化交流在考古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姆渡文化饮誉国内外。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建立了一个高起点的座标。将人类文化置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研究,正是二十世纪末中国考古学的努力方向。但河姆渡遗址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并不为更多的遗址所能具备,而类型比较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因此,河姆渡遗址的特殊优势未能够全面开拓史前考古的探索视野,这是学科科技应用上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遗憾属于过去,探索者的信念与足迹却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增值的。世纪回眸,我们仍然感到骄傲。

本篇所围绕的核心是以器物学为基础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河姆渡遗址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很宽,如瓜果的栽培、家畜的驯养、漆器的发明、航海业的端倪、纺织、音律等等,我们认为,凡此种种多属人类文明的阶段性成果或特殊性创造,不容易纳入具体的考古学文化范畴。甚至农业——新石器文明的基础,亦不在重点探讨之列。自从七十年代确立栽培稻的概念以后,稻作农业一直是河姆渡研究热门话题,关于河姆渡文化农业发展水平,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河姆渡农业已步入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①第二种观点是对耜耕说质疑,否认“骨耜”耕作功能,进而认为河姆渡农业尚未迈出“刀耕火种”阶段;^②第三种是“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说。^③但这些争议与特定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依然存在一定的距离。

什么是考古学文化呢?“考古学文化”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概念,而是指考古遗存中观察到的复杂共同体。它是一群特定的类型品(包括生产工具、陶器、装饰器等,还可加入精神方面的特征如墓地、艺术风格等),反复出现于同一地区、同一时代。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便可称为“考古学文化”。^④这一源自柴尔德的阐述是中国传统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对它的理解与把握则往往体现着区域考古学的进步轨迹。

(二)回顾与问题

从1973年河姆渡遗址发现,到1978年第一期考古发掘报告的发表,是河姆渡文化研究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最重要成果是确立河姆渡文化概念。但这一阶段的认识是粗略与轮廓性的,夏鼐在归纳河姆渡文化特征时主要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作比较,可见这一局限是时代性的。^⑤浙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则由此建立起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含崧泽类型)——良渚文化三个阶段发展关系。这也是对太湖——杭州湾地区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区域的实践性回应。

1977年,苏秉琦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太湖——杭州湾的古文化区域概念,与古吴越国相联系。这是苏氏区系类型构架的一部分。区系类型理论关注文化的源与流,关注发展关系,努力将考古学文化的理解纳入中华古文明形成的大格局中。在东南地区,泛青莲岗文化的争论从此悄然平息。^⑥

浙江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者开始面临一个区域性文化的理解与认识问题,亦即如何将一个纲架性、假设性概念充实进具体的、实证的材料,这里有共同的源吗?怎样解释环太湖乃至钱塘江南岸文化统一性的历史基础与实现途径?流向何处?怎样认同考古学意义上的吴越文化?抑或反证之。这是一个大题目,没有人或说缺乏条件直接切入正题,但这一问题不自觉地影响

着浙江史前考古学的成长。河姆渡文化的研究轨迹也似乎必然地因循着一个预设的因果关系。

1979年,浙江博物馆的专业队伍一分为二,成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的基本力量归考古所。1980年前后发表一系列浙江新石器文化考古论文,证明了一个新兴学术单位的研究能力。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框架,这一时候基本建立起来。这是浙江史前考古走向成熟的开始,而这一过程所围绕的核心之一,正是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有必要列出几篇代表性文章题目:

《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新石器时代部分,1979年)^①

《试论河姆渡文化》(牟永抗,1979年)^②

《二论马家浜文化》(姚仲源,1980年)^③

《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牟永抗,1981年)^④

《河姆渡文化再认识》(刘军,1981年)^⑤

与前一阶段相比,河姆渡文化的概念有了变化,内涵从河姆渡遗址四、三层扩大为四——一层全部。这一认识上的变化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但1984年夏鼐主编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⑥与后来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⑦均尊重、认同了浙江同志的主体意见。原因似乎不仅是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孤立问题,而关涉太湖以南新石器文化的认识体系。

河姆渡文化新概念的形过程分两步。第一步,意识到河姆渡遗址二、一层内涵与马家浜文化的差异,不能归入马家浜文化,但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依然可分为河姆渡(早期)文化——马家浜文化(含崧泽类型)——良渚文化三个发展阶段;第二步,正式形成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与杭嘉湖(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是两支并列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马家浜文化有自己的发展源头,这一认识与罗家角遗址的发掘有直接关系。

《试论河姆渡文化》第一次将河姆渡遗址四——一层作为有特殊发展关系的文化整体考虑,并将河姆渡文化分为早(四、三层)、晚(二、一层)两期,晚期与马家浜文化有较多的联系与共同点。因此,“长江下游南岸新石器时代几个文化的相对早晚关系是河姆渡文化(早期)——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⑧与此同时的另一种表述是“浙江新石器时代曾经历了河姆渡文化(第三、四层,距今7000—6000年)、马家浜文化(距今6000—5000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4000年)三个发展阶段”。^⑨(上述两段引文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两种表述是有歧义的,其中掩盖着一层没有明确的意思:如果河姆渡遗址二、一层不属于马家浜文化,那么河姆渡早期文化是否应认为有双向发展的趋向,太湖地区演为马家浜文化,宁绍地区则为河姆渡晚期文化。这个时候太湖地区虽已发现罗家角遗址,“下层接近河姆渡遗址三层”,^⑩但发掘工作尚未完成,文化性质与时代没有明确。可以认为,1979年河姆渡文化的认识尚有含糊之处,虽然提出河姆渡文化新概念,但仍处探索阶段。

1980年,罗家角遗址发掘工作结束,文化性质有了较充分的分析条件,特别是早于河姆渡文化的C¹⁴测定年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论马家浜文化》明确了马家浜文化源于罗家角遗址第四层的发展关系,正式提出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南岸两支不同的原始文化。^⑪同年发表的《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主要收获》则有了河姆渡四期文化的概念。^⑫

河姆渡文化的结论性表述完成于1981年杭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刘军的《河姆渡文化再认识》将河姆渡文化分为——四期,第一期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第二期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第三层,第三期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第二层。第四期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第一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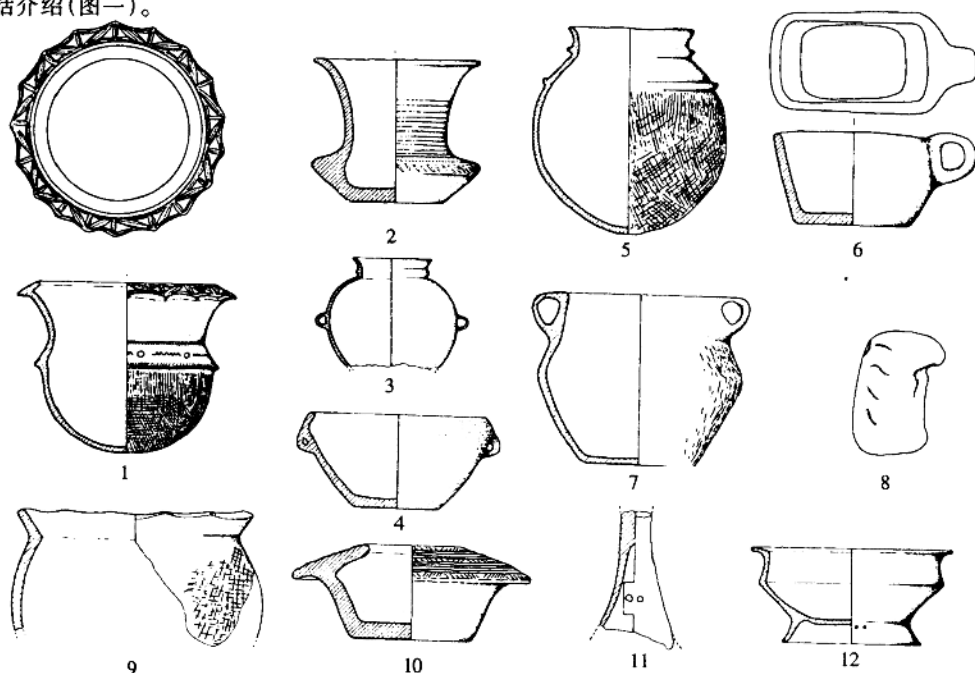
③

分析这一时期的学术轨迹,带有两个显明特点,第一,认识上的突破依赖于实证性材料,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对河姆渡文化的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同,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②第二,对考古学文化的理解服从于构建一个全局性的认识框架,具有强烈的学术倾向性。

举一个例子,河姆渡遗址二层新出现一种里黑外红的泥红陶喇叭形豆,形态特征与马家浜文化同类器基本一致,考虑到“马家浜文化已知的C¹⁴数据中,一般比河姆渡二层的数据为早,类似的共同性可理解为接受马家浜文化的影响”,这是1979年的认识。^③1981年,开始偏重于这类豆的豆盘形态与河姆渡遗址四、三层豆、盘钵的相似性与继承性,将两者形态或器类上的差异解释为演变衔接上的“缺环”。^④陶釜是证明河姆渡四期文化一脉相承性最重要的依据,但对陶釜形态演变的把握上有所偏失,如强调“脊”的弱化趋势,应当说,二层陶釜的弱脊或暗脊特征见于个别的器物,没有典型性。二层的主型陶釜——侈口圈底绳纹釜,正是河姆渡四层出现的、三层数量明显增加的同型陶釜——一期报告称为敞口无脊釜——自然演变来的。偏面强调河姆渡文化早晚期的继承性与发展关系,而对差异性分析不够,“缺环”这一虚设概念掩饰了文化因素分析上的不足,河姆渡文化的个案研究受制于钱塘江两岸文化各自体系的偏面追求。

河姆渡文化新认识立即在学术界产生影响,1981年,苏秉琦、殷玮璋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一文,将宁绍地区与太湖地区作了区分。^⑤

下面以刘军的认识为基础,^⑥结合其它同志的研究成果,对河姆渡四期文化的内容作一概括介绍(图一)。



图一、河姆渡遗址陶器

- | | | | |
|---------------|----------------|-----------------|----------------------|
| 1、釜 T26④ : 34 | 2、器座 T32④ : 62 | 3、罐 T35② : 12 | 4、钵 T34④ : 31 |
| 5、釜 T23④ : 44 | 6、钵 T37① : 40 | 7、罐 T23④ : 38 | 8、釜支子 T29④ : 39 |
| 9、釜井 1 : 204 | 10、盂 T36④ : 31 | 11、豆 T34② : 232 | 12、盆 T35② : 55(1/12) |

一期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余为夹砂黑陶,不见泥质陶。器形常见圜底器和平底器,圈足器少,不见三足器。种类主要有釜、罐、钵、盘、盆,还有釜支子、器盖、贮火尊、盂、豆等。有肩有脊的敛口釜和敞口釜、唇沿腹起折棱的盘、半环形双耳罐、敛口弧壁平底钵、实体方形的釜支子,均为典型器。器表流行装饰,多为拍印的绳纹、刻划的几何形图案和少数动植物图案,陶器制法采用泥条盘筑兼用捏制法;一些器物不仅外表有绳纹,胎心亦有绳纹,因此有“贴塑”法一说。^⑤陶器烧成温度较低,一般在800°—850°之间。骨木质生产工具发现最多,如骨耜、骨镞、骨哨、木矛、木桨等;石工具少而粗糙,见斧、镑、凿;发现块、管、环等石质装饰品。居住形式是干栏建筑。

二期陶器仍以夹炭黑陶为主,夹砂黑陶次之,出现极少量的泥质红陶。陶器的主要种类与形制沿袭前期,有肩有脊的敛口釜减少,无肩无脊的敞口釜增加。豆普遍使用,取代了盘、钵的主要地位,这种豆的主要形式,是覆置的无肩无脊釜上安置盘、钵,很有特色。新出现陶灶、小口广肩的小平底罐。器表装饰比前期单调,素面器增加。生产工具、装饰品、居住形式基本沿袭前期。发现有侧身屈肢的墓葬形式。

三期陶器中夹砂灰陶的数量超过了夹炭黑陶,泥质陶增加,有肩有脊釜基本消失,器形中增加了鼎、盂、卣等三足器和袋足器,垂囊盂、异形卣富有特色;鼎足多呈双目式圆锥外撇型;常见牛鼻形、鸡冠形罐耳。纹饰以素面为主,陶釜的绳纹装饰一如既往,圈足器增加了镂孔装饰;釜支子以拱背猪咀形最具特色。石器料的选用,以层积岩等软石类取代硬质变质岩,磨制进步,穿孔石斧多见。木骨质工具骤减。

四期夹砂红陶数量占主要地位,泥质灰陶次之,新出现匝、杯。圈足豆流行弧边三角、圆、方形的组合镂孔,釜支子多呈象鼻形,鼎数量增加,鼎足以凿形、三棱形富有特征,足面多见装饰图案。陶釜形态与前期相仿。生产工具多见通体磨光的石斧、背面带脊的石镑和石凿、石镞,穿孔石斧增加。

上述河姆渡四期文化的内涵把握是正确的,但尚有修正之处。所谓夹炭黑陶,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原应该有红衣,新发现一些标本,残留有脱落未尽的红衣,也就是说,特殊的埋藏环境可能使陶衣脱落或褪色,有些夹灰陶的器表偏灰,应该是陶衣褪色的结果。三层开始出现夹砂陶,二层夹砂陶数量占优,但一般被描述为夹砂灰陶,实际亦应该是夹砂红陶或红褐陶,除上述原因,使用过程的烟熏火烧亦起到作用,这是后来其它遗址证据所引出的话题。泥质陶类,二层的泥质陶基本为泥质红陶,部分因火候或褪色原因颜色偏淡、偏灰,仍应归为泥质红陶类,真正的泥灰陶是一层出现的,泥性细滑,有粉质感,圈足饰三角、圆、方形组合镂孔的陶豆多为这种泥质灰陶器,部分灰陶器出现稀薄黑衣。第一层出现有鱼鳍形(截面或呈T形)鼎足,偏晚,地层当有细分的可能。

另外,骨木质生产工具在晚期骤减,应当更多地从保存条件上去理解。

对钱塘江以南宁绍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认识问题,基本上达成了统一意见。但潜伏的分歧依然存在,并对以后的进一步研究产生了影响。牟永抗对浙江史前文化的体系性认识思考较早,成绩显著,颇有影响,在对河姆渡文化的态度上,偏向于从区域地理的意义上理解其统一性与连续性,这种区域意义实际上已超越了河姆渡文化本身,虽然对后续文化的良渚特征有所体察:“似乎存在着相当于良渚文化的第五期文化”,^⑥但这种谨慎的表达本身已反映了对良渚文化概念向钱塘江以南移植的怀疑或否定倾向。这种倾向至少影响了1985年发掘的绍兴马鞍遗址良渚时期遗存的认识态度。^⑦刘军是河姆渡文化研究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之一,更多地从本体角度认识河姆渡四期文化的发展关系,这一阶段虽未对后续文化发表具体看法,实际上是认同

良渚文化在宁绍地区的可能性存在的,这也从一个角度实现了钱塘江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从对峙走向统一的历史整合趋势,牟永抗实际上也感觉到钱塘江两岸文化相似性的潜在意义,在论述马家浜与河姆渡文化关系时,认为“随着考古发现,或许还可以把它们归纳于更大范围的文化区域之中”。^⑨如何归纳法,尚未见下文。这恰恰反映了对太湖——杭州湾区文化共同性认识上“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情结。

林华东在1982年便提出河姆渡文化与先越文化的关系,并从鸟图腾崇拜、习水便舟、巢居、种植水稻、有段石铈、几何印纹陶以及珍狗、食猴脑方面加以论证。^⑩河姆渡遗址四、三层发出不少鸟像图符资料,如雕刻在象牙质鸟形器上著名的“双鸟朝阳”。但鸟崇拜意识和有段铈的区域性演进均无法避开良渚文化。这实际上又将钱塘江两岸纳入一个认识整体,那么又怎样去理解前良渚时期两岸文化的差异性?问题最终还需归结到新石器时代。

不能漏过的是,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后,浙江本土的研究者仍有坚持河姆渡遗址二层属于马家浜文化的观点者,代表人物是汪济英。他在1984年发表的《河姆渡文化——七千年前长江流域的史迹》^⑪一文中坚持认为河姆渡遗址的第四、三层在文化面貌上不同于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是正确的,第二、一层虽是河姆渡文化的直接继承与发展,但已较多地融合了邻近文化的因素,地区特色有所减少。汪所关心的还是如何理顺文化的发展关系问题,他明确认为宁绍地区存在良渚文化,并试图有所解释。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强调:“原来把河姆渡遗址一、二层分别归属为马家浜文化的崧泽类型与马家浜类型,基本上是正确的,否则,就会使人感觉到河姆渡文化发展到后来不知所终,而实际存在于宁绍平原的良渚文化却成为突如其来的天外之物”。^⑫但河姆渡文化无论演变为良渚文化,还是演变为马家浜文化,似乎均存在“不知所终”的问题。实际上,宁绍地区的“良渚文化”仍然存在对河姆渡文化传统继承性的一面。

从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到1987年,宁绍地区的考古工作没有进一步的开展,^⑬1979年就河姆渡文化分布问题作了一次专题性的考古调查,在萧山、绍兴、上虞、余姚、宁波、鄞县、奉化、象山以及舟山地区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⑭这次调查,基本形成河姆渡文化——宁绍平原(地区)的文化区域概念,这是确认一个考古学文化所必备的重要条件。因此,河姆渡文化研究在1980年前后形成了高潮,之后,客观上形成一段时间的沉寂。

(三)探索与提高

198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河姆渡研究课题组,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宁绍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同时完善河姆渡文化的基本概念。当时提出三方面的要求:①河姆渡文化的分布;②河姆渡文化的后续文化;③填补河姆渡文化二、三之间的“缺环”。

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1979年的调查已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宁绍平原至舟山群岛的地域概念仍嫌笼统,分布其间的遗址年代不一,而以河姆渡文化晚期乃至良渚时期的遗址居多,河姆渡早期文化遗址十分匮乏,河姆渡遗址外,仅在鳊山(朱山)、童家岙等一、二处遗可确有相当于河姆渡四、三层的遗存,分布于姚江流域附近的范围内。早期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主体部分,这一现状与宁绍平原的区域文化概念不相符。应当说,遗址的一般性调查比较容易发现浅表层的晚期遗物,对于深埋于地下的早期文化遗址,只有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才有希望更全面的掌握,这样的考古发掘在宁绍地区急需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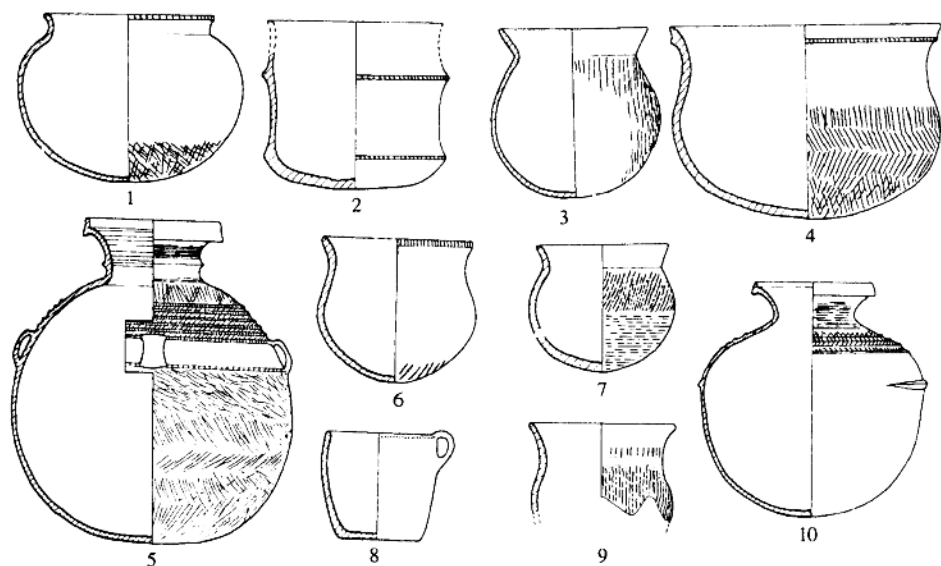
河姆渡后续文化,这一待定概念,说明钱塘江(杭州湾)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中尚存在

一段认识上的空白。河姆渡文化第四期的下限约在距今 5000 年左右,往后的发展情况怎样?虽然发现了相当于良渚文化的遗物,但必须掌握更丰富的、能反映真实内涵的、具体化的遗址的材料,才能进一步作出定性的认识与判断。

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内建立文化演进的基本序列,并围绕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线索确定阶段性的分布范围,是一个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上面的两个问题无需太多的学术背景。那么,第三个问题,即河姆渡文化二、三期之间的“缺环”问题,却是一个争议性的学术问题。宁绍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是“直线进化”、而是存在嫁接变异?河姆渡遗址二、一层的“马家浜文化说”赞同者渐少,但这并非河姆渡文化四期说得到充分认同。必须指出的是,当初河姆渡文化概念局限于四、三层内涵,二、一层尚归属马家浜文化时,崧泽文化是作为马家浜文化的一个类型看待的,后来崧泽文化被普遍认同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概念,^④这一认识上的质变是否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去观察河姆渡遗址二、一层之间的差异呢?这里也有“缺环”吗?我们有理由认为,河姆渡文化早晚期说跃进为四期说,可能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应当承认,浙江考古界对崧泽文化的认同有被动、滞后的倾向),后来是否又摒弃了太湖地区这个文化参照系了呢?因此,“缺环”问题不是一个狭隘的问题,其中隐含着对宁绍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逻辑环节作更准确把握的契机。

从 1988 年到 1997 年,宁绍地区一共进行了慈湖遗址、名山后遗址、塔山遗址、小东门遗址、鲞架山遗址、沙溪遗址、鲰山遗址共七个遗址的十次正式发掘。

慈湖遗址,^⑥位于宁波市慈城镇西北,1988 年发掘。分上、下两个新石时代文化层。上层出土鱼鳍形足鼎、截面呈 T 形足鼎、双鼻壶、宽耳杯、口沿饰锥刺纹图案的罐,与良渚文化同类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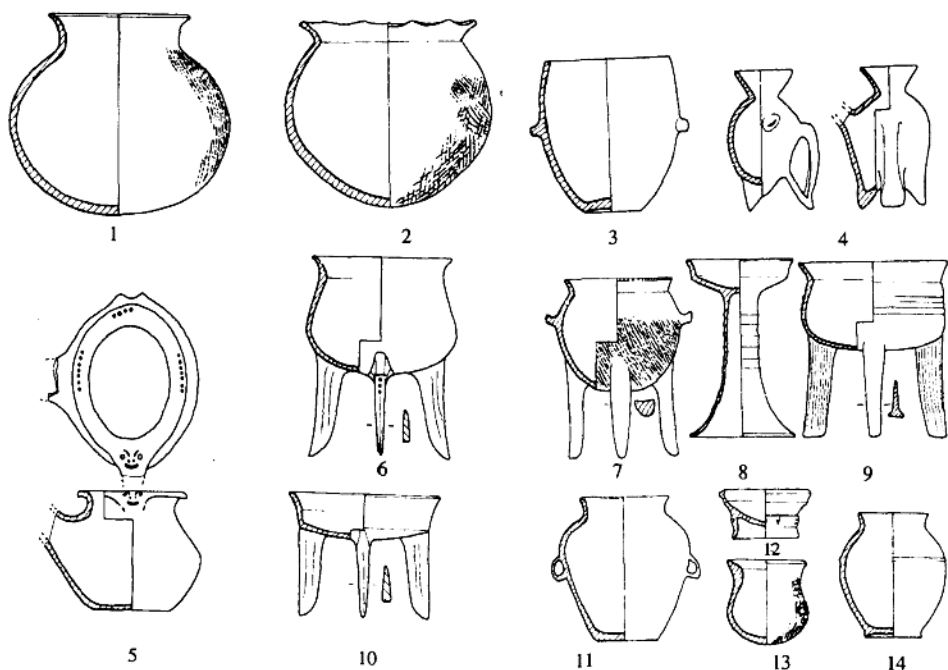
图二、慈湖、鲞架山遗址陶器

- | | | | |
|----------------|---------------|-----------------------|---------------|
| 1、釜 T42④ : 18 | 2、釜 T14④ : 3 | 3、釜山山 M3 : 2 | 4、釜 T42④ : 19 |
| 5、罐 M2 : 4 | 6、釜 T42④ : 9 | 8、罐 H8 : 1(以上鲞架山) | |
| 7、釜 T504 下 : 1 | 9、釜 T210 : 74 | 10、罐 T402 下 : 8(以上慈湖) | |
- (1~9, 1/8; 10, 1/12)

特征基本一致;绳纹与镂孔是该层主要装饰,绳纹见于釜(鼎)类炊器上,镂孔见于泥灰(黑皮)豆的圈足部位,这与典型良渚文化存在差异。仅有一个C¹⁴年代测定数据为距今 5365±125 年(树轮校正)。下文化层面貌复杂,器形有罐、釜、盆、钵、鼎、釜支子等,翻沿束颈红衣的罐很有特色,肩部一般饰附加堆纹间以刻划纹、中腹有鸡冠状或牛鼻耳,下腹多拍印篮纹。侈口圜底绳纹釜及釜支子等器形特征接近河姆渡遗址二层(图二),但又出土鱼鳍形鼎足。慈湖遗址上层被确定为良渚文化层,并提出了良渚文化钱塘江以南类型的概念,这是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慈湖遗址上下文化层均发现数量较多的木质器具,说明只要具备相应的保存条件,有机质工具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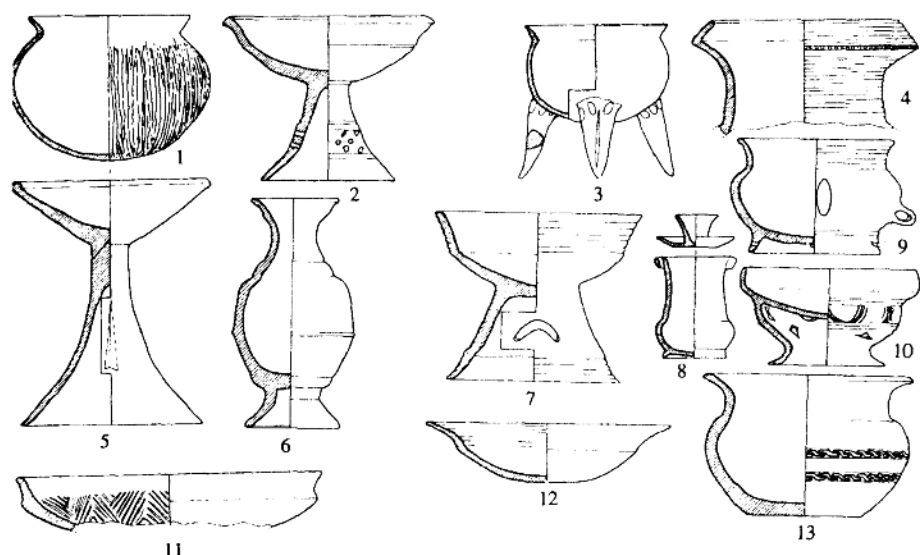
名山后遗址,^⑥位于奉化市南浦乡,1989 年,1991 年两期发掘,遗址分出十一个新石器时代地层。12-10 层相当于河姆渡遗址二层;9、8 层相当于河姆渡遗址一层;7-2 层相当于良渚文化层。名山后遗址丰富了河姆渡文化三、四期内涵,为进一步的时间分段提供了依据。尤其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了良渚时期钱塘江两岸文化比较范围,数量众多的鱼鳍形(截面或呈 T 形)足鼎、泥质黑皮陶竹节把豆、双鼻壶等器形特征与典型良渚文化别无二致;黑皮陶豆片上发现阴线刻划的“鸟首盘蛇体”图案,与福泉山、亭林等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标本如出一辙,首次发现叠压于良渚层下的大型土台遗迹,证明了钱塘江两岸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共同性的扩大(图三)



图三、名山后遗址陶器

- 1、釜 T104⑩ : 1 2、釜 T0910⑩ : 2 3、釜 T1614⑩ : 2 4、罐 T1514⑩ : 1 5、罐 H2 : 1
6、鼎 H12 : 1 7、鼎 H23 : 3 8、豆 H31 : 1 9、鼎 H14 : 44 10、鼎 T1715④ : 1
11、罐 H22 : 1 12、圈足盘 M4 : 4 13、釜 M4 : 3 14、罐 M : 1(1/8)

塔山遗址,^⑧位于象山县丹城镇东,1990年、1993年两期发掘,遗址分出五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层,9、8层相当于河姆渡遗址二层,7层相当于河姆渡遗址一层,6、5层相当于良渚时期。9层下发现墓葬40座,均为单人葬(含二次葬),依墓向、随葬品、分布的位置关系分作三组,甲组墓葬墓向朝东南,随葬泥红陶喇叭形圈足豆,间或有玉玦,分布在基地的西南部;乙组墓葬墓向朝东北,随葬釜、盘、钵等,陶釜一般为侈口圜底,饰绳纹,分布于基地东北部;丙组墓分布于中部位置,墓向不一致,随葬品的类型与特征迥异于甲、乙两组,有鼎、罐、豆等。这种分组现象应当反映墓主人血缘与族属的区别,甲组的泥红陶豆一般认为是马家浜文化的典型器,乙组绳纹釜沿袭河姆渡文化传统。这一珍贵资料对探讨河姆渡二层文化的形成有很裨益。中层亦发现十五座葬,其中有合葬墓,随葬品以釜与圈足盘(豆)为主。良渚层发现鱼鳍形足鼎、双鼻壶、竹节把黑皮陶豆,但绳纹陶釜仍在炊具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图四)。



图四、塔山遗址陶器

- 1、釜 M31:3 2、豆 M41:2 3、鼎 M29:5 4、釜 T0910③:1 5、豆 M17:1 6、壶 M44:4
7、豆 M29:3 8、壶 T0810⑤:4 9、罐 M29:2 10、圈足盘 M43:1 11、刻槽盆 F1:5
12、钵 M26:2 13、罐 M41:3(约1/8)

小东门遗址,^⑨位于宁波慈城镇北,1992年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三个时期,即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的二层的下层,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的一层的中层,相当于良渚时期的上层,三个阶段性的文化特征十分明确。

养架山遗址,^⑩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分早晚两期,早期的C¹⁴测定年代距今6300年至6000年,相当于河姆渡文化二期后段,内涵接近河姆渡三层,如出土数量较多的筒形有脊釜、侈口圜底釜等。晚期出土的侈口束颈红衣罐与慈湖下层陶罐比较接近(图二)。养架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器一般有施有新鲜的红衣,这可能是特殊的保存环境决定。早期还发现围绕红烧土遗迹的“瓮棺葬”现象。

沙溪遗址,^⑪位于宁波北仑区柴桥镇东,1994年、1996年两期发掘。遗址主体部分属于一种“多层灰面”的大型遗迹,相当于良渚时期,出土鱼鳍形(截面或呈T形)足鼎,竹节把豆、黑皮陶